

# 年轻人为什么钟情喜剧

## 面对面

对话人：叶青(中央戏剧学院青年教师)  
石介甫(单立人喜剧创始人)  
李楠楠(喜剧综艺《喜人奇妙夜》总制片人)  
王璐(本报记者)

如今,喜剧拥有自己的“十二时辰”。白天,游客拖着行李箱就直奔相声茶馆、小剧场;下班途中,多了些赶着去“说段子”的年轻人,在零门槛脱口秀的“开放麦”舞台,只要有料,谁都可以拥有5分钟的高光时刻;夜晚,喜剧综艺线上热播,脱口秀、素描喜剧等喜剧新形式层出不穷,打开短视频平台,喜剧片段聊足了劲儿,输送密集的“梗”,各种播客平台上,相声的播放量总是居高不下。

在“笑”被算法重新建构的今天,喜剧有什么新面貌?年轻人为什么钟情喜剧?近日,本报记者对话青年学者和来自一线的喜剧创作者,共同探讨。

### 一扇情绪的窗户 从“我逗你”到“我是你”,给观众当“嘴替”

记者:从剧场茶馆到“相声巴士”,从传统曲艺到层出不穷的喜剧新形式,喜剧是时代的回声。互联网时代,喜剧呈现出哪些新特点?

李楠楠:做喜剧综艺4年,我最大的感触是“各花入各眼”,观众对喜剧新概念、新形式的接受度越来越高,喜剧审美越来越个性化。

石介甫:从“我逗你”到“我是你”,大家期待喜剧不光好笑,还得提供情绪价值,有更强的共鸣,给观众当“嘴替”。生活艺术化、艺术生活化正在双向而行。

叶青:的确如此,我们可以看到脱口秀中“喜剧人格”对作品的覆盖。喜剧不再仅仅是演员在舞台上封闭的、自足的作品展示,而是演变为一个围绕演员展开,贯穿节目内外、线上线下乃至社交媒体的连续性文本。这种“喜剧人格”本身就是作品的总和,它依赖连贯性,要求每一次表演、每一个亮相都被回收进这个“喜剧人格”的框架中,从而形成一种有意回溯、扣题的

效果。这是喜剧审美与互联网文化深度融合的体现。

记者:喜剧审美是否也存在“代际性”,比如老一辈人习惯看小品、听相声,年轻人喜欢脱口秀、追线上综艺、看素描喜剧。怎么看待喜剧形式和偏好的变化?

叶青:形式、偏好变化的背后,是文化心理、媒介等“基础设施”带来的影响。看小品、听相声,是基于电视机在中国家庭创造的客厅文化,作品往往通过讽刺与温情的平衡建立共鸣。互联网时代,基于个体生命体验的新兴喜剧更强调情绪快感,快速出梗,不断“升番”,“幽默”就是要笑得纯粹。

石介甫:形式只是载体,观众最在乎的还是内容本身。20年前情景喜剧《武林外传》中的经典台词,今天的观众依然津津乐道,说明表达内核的挺括,才是喜剧的硬通货。我小时候看《曲苑杂坛》,里面用评书的方式讲天气预报,给我留下了喜剧的“耳音”。也许未来,Z世代会记得脱口秀的金句、素描喜剧的桥段。

### 一份认同的力量 抓住人看得到而没意识到的瞬间

记者:更简洁的形态、更深刻的共鸣、余味更悠长的内涵……喜剧的流行需要“触点”,今天的喜剧“戳中”年轻观众的“点”是什么?

石介甫:脱口秀的本质是人和人面对面交流。共鸣建立在人人看得到而没意识到的瞬间,观众爱的不是标签新,而是洞察新。年轻人的语言习惯、情绪痛点和生活体验都被一股脑儿地打包进了段子。这其中,最重要的是真诚,把你感知的温度和观察的角度传递给观众。脱口秀演员周奇墨曾讲怎么教他爸爸用网购平台,描摹他爸爸怎么戴老花镜、怎么打字……这

种细腻的模仿包裹着他的态度、他的温情,观众很喜欢,很有代入感。

李楠楠:喜剧是生活的灵光一现,喜剧要与生活一同新生。我们节目中的作品《三毛保卫战》,3位演员演3根头发,从头发的视角看待和讲述现代人的生活,很有意思。每一个登上《喜人奇妙夜》的作品,都经历了多轮线下展演,创作者会记录观众在哪里笑了,哪里“不对了”,验证哪些“包袱”是成立的。在与观众的频繁互动中,找准打动观众的“点”。

叶青:诞生于1990年的小品《主角与配角》,今天看来依然是优秀作品。它的表层笑点来自角色身份的错位——“配角”非要演“主角”。更深层的原因在于,它精准捕捉了社会快速变革时期的大众心态,人们希望通过奋斗寻求突破,当自己人生的主角。

可以说,打动观众的喜剧作品必然是其所处时代的“信使”,体现一个时代的情感记忆,甚至突破时代局限,触及人类共通的情感结构与生存命题。

记者:很多创作者感慨,几十万人在弹幕里“写稿”,“创作”极为高效。现在,不少“业余”喜剧从业者加入创作队伍,在喜剧、脱口秀的舞台亮相。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叶青:“业余”喜剧从业者的崛起,是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的缩影。新兴的喜剧形态同时生产着自己的观众与演员,关键在于如何与“专业”进行有效融合,用专业的方法去提炼和结构化他们的生活素材。

石介甫:不同行业的人为喜剧创作带来了更丰富的视角,这其实是脱口秀的文化基因。人们在台上通过表演找到自己的“喜剧人格”,寻找另一种可能性和成就感。

李楠楠:创作素描喜剧时,大家围绕任何一个人提出的创意,即“点子”,在结构里“蹦”素材,不断添砖加瓦,最终形成一个完整的作品。

每个人的喜剧天赋不一样,用“共创”理念打磨作品,对人和事的观照将更具共通价值。

### 一种生活的态度 上舞台、演自己,喜剧的艺术就是希望的艺术

记者:未来,喜剧在艺术形式和表达方式上还有什么可能性?新形式的喜剧如何维系生命力?

叶青:当前,喜剧已经和年轻人的生活紧密结合在一起,既满足放松需求,又提供氛围陪伴。未来,这种趋势将更明显,喜剧市场将从专业剧场、综艺向更广泛的消费场景、社交场景、心理疗愈场景延展。

跨界介、超类型喜剧将带来惊喜。AI(人工智能)本身可能催生新的喜剧语言,AI生成的语言和逻辑有其特色,同日常交流存在一定的“错位”,可能会让我们看到人机协同的全新“喜剧语法”。

石介甫:喜剧头部演员围绕其稳定的“喜剧人格”,会进一步拓展自己的表演方式。喜剧市场将进一步走向细分,更多脱口秀演员会探索更风格化、更具标签性的表达,也随之拥有更稳定的观众群。

李楠楠:无论表现手段如何丰富,都要遵循艺术规律。每一个喜剧点子诞生的时候,它的成长方向一定程度上就有迹可循了,随之诞生的情感和表达也会自然流淌出来。我相信,观众永远拥抱真情实感的表达。

记者:所有年轻观众总结说,喜剧拼的是“艺术人生”,是不可复制的生命经验和世间百味。

石介甫:当我们讨论喜剧,其实是在讨论一种人生观。比如我们常说“上舞台、演自己”,用喜剧“加工”自己的日常,这表明了一种态度——任何生活的困难都无法击倒我们,让我们失去表达的勇气。我们正在做小规模喜剧体验课,以前是培养演员,现在是请普通观众来听,希望他们了解脱口秀演员的创作,更重要的是理解喜剧创作者怎么笑对挫折、建立好好生活的信心,让更多人感受这种达观。

李楠楠:我至今记得《喜剧这回事》这本书的主旨:喜剧是普通人的故事,虽然我们有所欠缺,但每个人都可以被理解、被爱。幽默提供了一种“认知上的安全距离”,用喜剧的方式去看待人生,会安慰到生活里的我们,“喜剧的艺术就是希望的艺术”。

# 『底料得足,食材得鲜,火候得恰到好处』

冯巩

作为一名演员,想为观众服务,就要不断拓展表演的舞台。我经历过从剧场到广播、从广播到电视的转型时期,赶上了互联网时代,也要努力适应这个新舞台。

如果说以前的相声小品是“自行车”,那么如今的短视频创作就是“共享单车”——人们扫完码就骑走,几秒钟不乐呵,人家“啃”一声就换了一辆了!短视频要求篇幅短、节奏快,但对我来说,创作精神和理念是不变的,就是一定要扎根生活、与时代同步。

今年春节,我参演的几个作品追求各有各的味道,像北京台春晚的烟火味儿、辽宁台春晚的接地气儿、B站春晚的时尚味儿。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要不断学习。我们在B站春晚表演的作品叫《网络盛宴》,创作团队把最新的网络用语都搜罗了一遍。第一场演出,我们去了大学,效果很好,让我增强了信心。第二场,观众是中小學生。当时我担心,孩子们能不能接受?没想到效果依然火爆。在表演这个节目的时候,我感觉到年轻人没有了代沟,舞台上没有了壁垒,自己也变年轻了!回到家和家人聚餐,我通过那些网络热词和我的孙子交流了起来,感觉祖孙间都多了不少共同语言。

获得观众的的笑声就像吃火锅——底料得足,食材得鲜,火候得恰到好处。底料足,就是作品的立意和结构要扎实;食材新鲜,就是内容和语言要鲜活;火候恰到好处,就是包袱节奏不能拖,火候不到则不热,火候过了又老了。可以说,抓住了观众的欣赏节奏,就是寻找到了时代的审美节奏。只有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才能创作出具有时代精神的优秀作品。那些能沉淀下来、经得起时间检验的喜剧经典,正是因为接地气、有根基,才能在土壤里发芽生长,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现在的年轻创作者赶上了好时候,新的媒介带来新的机遇,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对创作者来说,AI(人工智能)是“帮手”,不是“对手”。现在AI可以服务很多领域,但是在相声小品的创作上还没达到高水平。它能模仿“套路”,但复制不了“灵感”和“风格”。我想和喜剧创作者分享自己的感悟,那就是角度、态度和温度。选取巧妙的角度,作品才会趣味横生、事半功倍;表达创作者的态度,作品就有了立意,言之有物才能引人共情;观众笑过之后,要有余味,要有关怀,传递正能量,弘扬真善美。未来的喜剧创作者,要把精力更多放在“立意”和“情怀”上。只要心里装着观众,把握时代脉搏,喜剧的路就会越走越宽!

(作者为中国曲艺家协会主席、一级演员,本报记者王璐采访整理)



本版邮箱:ysjbs@peopledaily.cn  
本版责编:周飞亚  
版式设计:赵偲汝

## 创作谈 还原历史的温度 ——关于《伊文思的中国情缘》的拍摄

荷兰纪录片大师伊文思一生拍摄80余部电影,在中国拍摄的40部影片记录下20世纪中国的重要时刻。1938年,他冒着战火来到中国,拍摄《四万万人民》,让世界第一次较为完整地看见中国人民在民族危亡时刻捍卫民族独立自由的决心和艰苦卓绝的抗争,也由此开启了他与中国长达半个世纪的情缘。

此后,他一次次来到中国,拍摄中国、传播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早春》用诗意的影像,描绘了新中国土地上充满希望的劳动与生活图景;70年代的《愚公移山》记录普通中国人的声音与表情;直至80年代,他将自己对中国文化、文明精神的体认,融入人生最后一部作品《风的故事》,用哲思建造一座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伊文思为什么会在20世纪30年代从西班牙战争转向中国抗战现场?他是通过怎样的路径进入中国?是什么样的历史契机和内在动力,使他在此后几十年里一次又一次回到中国?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开始了《伊文思的中国情缘》的创作。影片以当代荷兰导演荷内·希格斯的追寻作为线索。荷内在大学时期观看伊文思电影时,心里就有一个挥之不去的谜:中国为何如此吸引伊文思?于是他来到中国,想要探寻伊文思的心路历程。荷内的视角既是个人,也是当代西方重新理解中国的一种方式。他的寻访,沿着伊文思的足迹,在档案与现实之间往返,将历史影像与当下生活对照。

影片拍摄历时2年,跨越了荷兰、法国、德国、俄罗斯、加拿大等国家,也走过中国多个城市与地区,从香港、武汉、台儿庄,到呼伦贝尔草原、江南水乡,再到北京的中学、上海的药店以及黄山之巅。我们始终相信,那些曾经被伊文思镜头记录的人和地点,是理解其作品历史价值的密钥。

我们来到台儿庄时,很难将眼前的春日景象与历史影像中浴血奋战的战场联系在一起。这里曾在抗日战争中被战火摧毁,如今古城已重建,大运河两岸桃花盛开。我们也重访了《早春》中套马人的家人和表演《双推磨》的小姐妹,伊文思影像中那些生机勃勃的劳动、合作的场景与百姓改善生活的愿望,在几十年后得到了时间的回应。

《球的故事》的重访尤为关键。这部影片是《愚公移山》中的一集,1977年曾获得法国电影凯撒奖,在国际社会引起广泛关注,但也曾遭遇“是否摆拍”的质疑。为回应这一争议,摄制组几经周折,终于在香港找到了主人公贾裕民。影片中那名中学生已是花甲之年的工程师。他与当年的老师、摄影师一起回到母校,回到那间曾发生过讨论的教室。当往事在现实空间中被重新讲述,记忆与影像彼此印证,历史成为可以被感知、被确认的事实。

《伊文思的中国情缘》的最后,荷内导演也像他的老乡伊文思一样体验到中国文化的魅力。他爱上了中国,决定移居中国。他在长城脚下找到一座农家小院,享受作为一名北京人的美好生活。两代荷兰人与中国的传奇故事显示了中华文化温润而持久的生命力,也展示了中西文明互鉴的美好前景。也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伊文思的中国情缘并未随着时间终止,一直延续到今天。

(作者为纪录电影《伊文思的中国情缘》导演)

## 照见生命的托付

张建珍

在江苏省人民医院的抢救室,一名27岁的肿瘤患者用尽最后力气问:“我是不是要死了?”半小时后,她在我们的镜头前离世。那一刻,无人能抑制泪水。这样的瞬间,在急救室的24小时里反复上演,它构成了我们拍摄纪录片《中国医生3:急诊24小时》最原始的冲动——去记录这个永不熄灭的空间,如何成为观察一个国家生命保障体系的窗口,如何浓缩人类面对生死时最极致的信任、抉择与守护。

这部纪录片的雏形,源于中华医学会急诊医学分会前任主任委员吕传柱教授的一个初心:用影像呈现中国急诊医学的全貌。这个构想对我启发至深,一部医疗纪录片的价值,远不止于讲述几个动人的故事,它更应当将故事置于其赖以发生的广阔背景之下——那支撑生命、精密协作的体系,那不断探索、敬畏生命的学科和行业。

我们的镜头试图勾勒一幅“中国急诊”的全景图:从国家医学中心,到省、市、县级医院,直至最基层的乡村卫生室。我们希望通过不同层级的立体呈现,让观众看到:当生命垂危时,从院前急救到多学科手术的“生命接力”如何展开;当村民突发急症,基层医生如何第一时间识别风险,并借助系统力量开启绿色通道。急诊,是国家医

疗体系“脉动”最直观的体现,它考验的是一个从乡村哨点到国家医学中心环环相扣、协同作战的系统能力。

急诊科是直面生死抉择最密集、最残酷的战场。医生们在这里经历的,不仅是医术的极限挑战,更是对人性、伦理与情感的持续炙烤。也因此,这里的医患关系往往最为紧绷,冲突的暗流时常涌动。做一名急诊科医生,需要一种超越常人的担当。那么,是什么支撑着他们?在“选角”与拍摄中,“人格魅力”是我心中一把无形的尺。它无关外貌声望,而是一种能在至暗时刻让人安心托付生命的气质。这魅力,是村医李俊义一年365天出诊总能保持淡定从容的气度;是北京协和医院马士程医生和患者共情的真实流露;是浙江嘉善120急救医生首次独立处理心脏骤停老人时的冷静;是陕西省人民医院年轻住院医师于抢救室独当一面、不断反思沟通方式的成长。他们并非完人,但那份将“救死扶伤”内化为本能的职业信念,以及在此信念下自然流露的担当,构成了他们共同的人格底色。

因此,我们的记录从未回避他们的脆弱、困惑与柔软。纪录片的使命在于求真,而后向善,终至达美。“真”是基石,我们不美化困境,不回避医学的局限;“善”是底



纪录片《中国医生3:急诊24小时》剧照。片方供图

线,我们保护每一名患者的尊严,理解每一份在极限压力下的崩溃与抉择;“美”则是我们作为创作者的艺术追求与呈现标准。我们力图在画面构图、场面调度、叙事节奏与信息密度的把控上,向剧情片靠近,抵达剧情叙事的情感浓度与思想强度。

剪辑历时一年半,每一个故事都经过反复斟酌。我常对团队成员说,这部片子或许还有另一个名字:每个人都是自己的英雄。拍摄结束许久,我的脑海里仍常浮现那些交织的画面。我忽然懂得,所谓生命的护佑,从来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由无数不同岗位的、平凡的心跳共同编织。

(作者为纪录片《中国医生3:急诊24小时》导演)

## 看见真实,才能理解彼此

孙子蔚



自英国的青年导演“看中国”活动中,来自赛里木湖附近的草原拍摄牧民。片方供图

对于大洋彼岸的“Z世代”而言,真实的中国是什么样的?在海外青少年的手机屏幕上,中国的形象有时体现为令人惊叹的机器人、电动车与现代化城市,有时是政治叙事下带有负面标签和威胁滤镜的冷漠“他者”——互联网加快了信息流动,却也带来被算法加固的信息茧房。打破偏见,或许需要一场“不设剧本”的体验。

由北京师范大学举办的跨文化交流活动“看中国·外国青年影像计划”(以下简称“看

中国”)于2011年启动。16年来,“看中国”以“小而美、深而活”的方式,邀请外国青年来到中国,实地探访、拍摄短片,在10余天的行程中沉浸式探寻真实的中国。2025年的活动共邀请来自40个国家的112名青年奔赴北京、重庆、安徽、福建等10个省区市,这些年轻人在万物

蓬勃、绚丽多姿的中华大地上进行文化体验,完成了112部短片。“一对一”是项目的关键。每一名外国青年导演都会搭档一名中国青年制片人,成为一路同行的工作伙伴。从街头巷尾的即兴采访,到拍摄间隙的一餐一饭,他们的合作如同搭建了一座微型的“跨文化桥梁”,把短暂接触变成稳定互动。选题怎么定、人物怎么选、边界怎么拿捏,都要摊开讨论直到达成共识。在此过程中,他们并肩协作、相互激励、迸发灵感,友

谊在深度交互中悄然而生。厄瓜多尔导演马可·洛佩兹说:“当我坐飞机到达中国时,我非常害怕,因为北京比我的家乡大10倍。直到第一天晚上我遇到了我的制片人,现在他是我大洋彼岸的兄弟。”美国导演吉姆·丹迪则说:“离开那天的悲伤是我所经历过的最大的悲伤,我不仅离开了中国,也离开了我的制片人,我的一部分在那时失去了。”许多外国导演用“友情”“伙伴”“感动”作为关键词来概括自己的10余天体验,有人在分别时洒泪机场,有人则开始计划下一次中国之行。

从“看风景”到“讲故事”,拍摄成为理解的钥匙。外国青年与拍摄对象深入交流,甚至同吃同住,在具体的生活场景里捕捉故事。这促使他们主动观察、提问和反思——镜头仿佛成了一把钥匙,引导他们把判断延后,把好奇提前,从观看转向思考和理解。

每年的“看中国”都会设定一个生动而开放的主题。譬如2024年的“美·行·美·景”主题,围绕旅行、美食等生活化内容组织创作;2025年的“创意·梦想·创造”主题,聚焦中国社会的创新活力。年度主题如同友好的路标,既提供了清晰的探索方向,又留下了巨大

的诠释空间,将宏大的中国印象化为可触摸、可深入的生活切面。在同一主题下,不同文化背景的青年导演给出了千姿百态的答案。以“辽宁行”的10名导演为例,拍摄选题从传统船艺到现代捕鱼技术,从皮影艺人到街头舞者,从专业杂技演员到海风中磨练的渔民……分散的、迥异的个人叙事在同一片天空下呼应,共同拼贴出真实、立体、生动的中国。

“看中国”也鼓励导演们把作品带回各自的国家传播。来自不同国家的青年导演,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分享他们的作品和幕后故事:晃动的画面,即兴的采访,热情的感叹……这些第一视角的、充满人情味和烟火气的短片,阐释着中国多样而真实的魅力。影片外,他们的经历也在朋友、家人、社群中引发涟漪式讨论。葡萄牙指导教师龚赛乐半说:“‘看中国’应该改名‘爱中国’,它让我们每一个参与者都爱上了中国。它或多或少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观、价值观,甚至人生轨迹。”

看见真实,才能理解彼此。当10余天行程结束,真正留下的往往不是某个“答案”,而是由无数微小瞬间组成的温暖感受:是街头陌生人的微笑,是搭档在深夜剪辑时的陪伴,是拍摄对象手心传递的温度。这些记忆,连同那些有点抖动却无比真诚的影像,共同汇聚成超越语言与国界的力量——看,这是我遇见的中国。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